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四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

信夫清三郎 著

周啓乾 譯



桂冠政治學叢書

日本近代政治史

第 四 卷

走向大東亞戰爭的道路

〔日〕信夫清三郎著

周 啓 乾 譯

桂冠圖書公司

日本近代政治史／信夫清三郎著；周啓乾譯。

-- 初版.-- 臺北市：桂冠，1990〔民79〕

冊； 公分.--(桂冠政治學叢書；
18-21)

含索引

ISBN 957-551-137-9(一套：平裝).--

ISBN 957-551-141-7(第四冊：平裝)

1. 日本—歷史—近代(1905—1945) 2. 政治
—日本

731.26

桂冠政治學叢書②1

日本近代政治史(四)

原 著／(日) 信夫清三郎

譯 者／周啓乾

執行編輯／萬嘉玲

發行人／賴阿勝

出 版／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 10769 新生南路三段 96-4 號

電 話／3416949・3631407

電傳(FAX)／886-2-3969194

郵撥帳號／0104579-2

登記號／局版台業字第 1166 號

印 刷／海王印刷廠

初版一刷／1990 年 12 月 (印數：1~2,000)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調換。

定 價／新臺幣 300 元

ISBN 957-551-137-9 (套)

ISBN 957-551-141-7 (第四卷)

凡 例

一、敘述方法見第一卷凡例。

二、日本的歷史學一般將「大東亞戰爭」稱爲「太平洋戰爭」。這是因爲，當 1941 年 12 月日本向美英兩國宣戰時，在太平洋進行對美英戰爭的海軍也曾建議稱爲「太平洋戰爭」。所以，即使稱爲「太平洋戰爭」，也不能算是十分歪曲真相。然而，大本營則認爲，若要把「中國事變」也包括在內，「太平洋戰爭」的稱呼就是不適當的，「由於不管願意與否，隨時都會發展爲對蘇戰爭，所以應增加建設大東亞新秩序之政治意義」，稱之爲「大東亞戰爭」（種村佐孝：《大本營機密日誌》，鑽石社，1952 年，第 110～111 頁）。由於對美英的戰爭正是日本從「中國事變」的矛盾中挑起的戰爭，爲了正確把握戰爭的歷史性質，將其稱爲「大東亞戰爭」，當比稱作「太平洋戰爭」更正確。我們一刻也不能忘記，日本自 1931 至 1945 年的十五年間的歷史主流，是對中國的侵略。將十五年間對中國的侵略稱爲「十五年戰爭」，也是明確表示侵略中國之意味的一個方法（參見久野收：《圍繞十五年戰爭的意義》、《戰爭體驗的批判與繼承》，以及《展望》1970 年 10 月號）。本書有時也使用「十五年戰爭」這個稱呼。有人批判地說，雖說是十五年戰爭，但並不是在這十五年間持續地進行了戰爭。其實，自十四世紀至十五世紀的歐洲「百年戰爭」，也並不是接連不斷的戰爭。

三、關於本卷所敘述的歷史範圍，我已寫有《大正政治史》

(合卷本，勁草書房，1969年)及《大正民主史》(合卷本，日本評論社，1968年)。這些著作中敘述的史實，本卷儘量予以省略。本卷的內容與我所著《戰後日本政治史》(共四卷，勁草書房，1965～1967年)相銜接。

作者的話

——致中譯本讀者

透過周啓乾等氏的譯筆，我的《日本政治史》能夠獲得中國的讀者，我作為原作者感到十分高興。他們又給了我直接同中國讀者談話的機會，這是我更為高興的。

中國讀者一定會對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戰敗之前的日本國家劃定為「絕對主義國家」的見解懷有很大疑問。中國的歷史學把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西歐出現的英國都鐸王朝及法國的波旁王朝之「專制王權」當作「封建主」的「封建專制王權」。^①這裡所說的「專制王權」雖然就是歐洲的歷史學所說的「絕對王政」(Absolutism)，但我並不把「絕對王政」理解為「封建專制王權」。我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尼科斯·普蘭查斯所說，把「絕對主義國家」(L'État absolutisre)當作從封建國家向資本主義國家過渡時期所出現的「過渡性國家」(État de transition, État transitoire)。^②日本的政治學家藤田省三指出，絕對主義國家的歷史任務在於，完成「經濟基礎方面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同時「將全部行政手段集中於國家結構的頂點，並由此而斷然實行近代『國家』

① 北京大學歷史系簡明世界史編寫組：《簡明世界史》〈古代部分〉，1978年，第303～305頁——作者注。

② Nicos Poulantzas, 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 de l'état capitaliste, François Maspero, 1968, pp.169～80.

的原始積累」。^③近代國家的第一個目標，乃是國家主權的確立。確定了國家主權的絕對主義國家，便作為創建近代國家的槓桿而在歷史上發生作用。

肩負著絕對主義國家的絕對君主，為了擺脫戰爭和革命的危機，便要使其統治形態作適應時代需要的變化。當搶在時代變化的前頭，使自己成功地發生變化時，絕對君主就能夠以新的姿態繼續生存；當被時代的變化拋在後面時，絕對君主則將喪生。作為與西歐各國不同的後進國的普魯士、奧地利、俄國等東歐各國的絕對君主，在十八世紀後半期，為擺脫危機而採納了啓蒙主義，便使自己的統治形態變化為「啓蒙的專制」（啓蒙的絕對主義）。啓蒙的絕對主義給自己提出的歷史任務，就是為趕上西歐各國而實現「西歐式的近代化」。^④

啓蒙絕對主義為了克服 1848 年觸發的新危機，便引進立憲制度，使統治形態變為「立憲的絕對主義」（表面的立憲制）。這雖是「來自上面的革命」，但「來自上面的革命」的本質，却是對於「來自下面的革命」的「反革命」。因此，絕對君主並沒有讓出權力，而是在自己掌握主導權的情況下引進立憲制度，將自己的統治形態加以修改，使之能夠適應新的情況。普魯士的統一德國與俾斯麥建立「虛有其表的立憲絕對主義」，就是其最典型的表現。^⑤

③ 藤田省三，《天皇制國家的統治原理》，1966 年未來社，第 64 頁——作者注。

④ John G. Gagliardo, *Enlightened Despotism, Europe Since 1500 Series*, 1967, pp.87~88, ——作者注。

⑤ Gordon A. Craig *Europe Since 1815*, 3rd ed.,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1, p.339. Craig, *The Politics of the Prussian Army, 1640~1945*, A Galaxy Book, Oxford U. P., 1955, pp.217~219. Craig, *Germany, 1865~1945*, Oxford U.P., 1981, pp.44~46.——作者注。

與普魯士統一德國大體同時而實現了明治維新的日本，雖為後進國，卻認識到要迅速實現「西歐式的近代化」，以此作為自己的使命，於是引進德國的憲法制度，建立了「明治國家」的體系。明治國家的顯著特徵在於以資本的後進性為基礎之經濟權力與政治權力的顯著差距。肩負著形成明治維新的這種形式之近代國家任務的官僚軍閥，仍然沒有讓出權力，雖然為了修正自己的統治而引進了立憲制度，要束縛議會的權力，維持專制實體。由 1889 年公布憲法和 1890 年開設議會而開始的日本新的政治史，乃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迅速發展而發展起來的經濟權力要縮短同政治權力之間的差距，以便把政治權力掌握於自己手中的過程，是要把以天皇的權威為幕後力量之官僚軍閥的專制統治（立憲絕對主義）改變為以議會權力為基礎的政黨統治（立憲主義）的過程，也是要使天皇制從絕對君主制向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君主制）過渡的過程。

日本的明治維新給正苦於西歐資本主義侵略的中國以很大的刺激。要以「西歐式的近代化」來對抗西歐資本主義侵略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的「時務論」，透過 1884 至 1885 年的中法戰爭和 1894 年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而露出破綻，「時務論」遂讓位於「變法論」。擔當變法運動的康有為，提倡進行以俄國的絕對君主彼得大帝的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維新為樣板的改革，在 1898 年起草了兩篇上書，即《進呈俄羅斯大帝彼得變政記序》和《進呈日本明治政變考序》。變法運動在 1898 年以「百日維新」而告終，遭到了挫折。但是，同康有為一起從事變法運動的梁啟超仍繼續主張變法論，並於 1906 年發表了論文〈開明專制論〉。變法論打算由行使皇帝權力的「開明專制」來實現「西歐式的近代化」的變法。可以認為由絕對主義(absolutism)掌握領導權的改革論，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的亞洲，尤其是要以日本為樣板，乃是強有力的。

然而，同是在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初，亞洲的變革論也顯

示出重大的變化。中國的革命家章炳麟於 1899 年初次來日，從 5 月至 7 月在日本作短時間的逗留。據日本的中國學學者高田淳所說，章炳麟「這時才由目睹明治三十年代〔十九世紀末〕的日本，看到康梁據以作為變法維新樣板的近代日本之實際狀況，從而（獲得）認識到必須尋求與此不同的中國革命方式的機緣」。^⑥印度國民大會黨的左派領袖提拉克（Bal G. Tilak）拒絕來自上面改革即「啓蒙的專制」（enlightened despotism），強調「抗議（protest）已不起作用，抗議與請願的時代結束了」，同時呼籲要注意「愛爾蘭與日本的實例」（the sample of Ireland and Japan）。^⑦作為與愛爾蘭相提並論的日本所表明的，已經不是由行使皇帝權力而實現的「開明的專制」，而是以爭取民族獨立的明治維新為目標的打倒幕府之武裝起義。

進入二十世紀以後，日本的政治史也進入了新的階段。議會的政黨在開設議會的同時還要求「議會的權力」，而向官僚軍閥挑戰。在發生中日甲午戰爭的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在產業資本確立以及向帝國主義轉化的急劇發展中擴大了勢力，便要在自己的領導下推進由官僚軍閥掌握領導權的絕對君主制向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的君主制）的過渡，加強了反對官僚軍閥的鬥爭。1898 年，日本出現的最早政黨內閣，與同時期的中國之戊戌變法一樣，以「百日改革」而告終。在日俄戰爭前後，官僚軍閥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產業資本的確立及向帝國主義的轉變這些自己所面臨的歷史任務，同時開始喪失使自己適應時代的能力。時代開始越過他們的視野向前發展。政黨（資產階級政黨）為了使隨著資

⑥ 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釗·魯迅——辛亥革命的死與生》，1974 年龍溪書舍，第 32 頁，——作者注。

⑦ R.P. Dua, The Impact of the Russo-Japanese (1905) War on Indian Politics, S. Chand & Co., 1966, pp.50~51.——作者注。

本主義之迅速發展而積累起來的經濟權力作為政治權力加以確立，便以實現政黨政治為目標而一往直前。以日俄戰爭後政黨勢力的發展為後盾，打算推翻軍閥巨頭山縣有朋之政治基礎的政友會領袖原敬所實行的廢除郡制運動，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的擁護憲政運動，以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米騷動為契機的以原敬為首相之政友會內閣的成立，1924 年的第二次擁護憲政運動與護憲內閣推行的「政黨政治」的開始，都是政黨和資產階級建立政治權力過程中的劃時代事件。但是，1930 年的統帥權論爭——政黨與軍隊圍繞一貫束縛議會權力的軍隊之統帥權和編成權所進行的論爭——却使由絕對君主制向立憲君主制（資產階級君主制）的過渡在最後遭到了挫折。

在本書第四卷第五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敘述中，有令人不盡滿意之處。我便又寫出補充內容，並請求譯者在可能情況下按補充的內容將第五章譯出。周啓乾氏欣然應允了。因此，本書中譯本第四卷第五章的內容與原版不同，但我希望以此譯本的敘述作為我的定論。再次對周啓乾氏表示深切的感謝。

信夫清三郎

1983 年 8 月 12 日

序

1

本書是我把近代日本的政治史作為通史來敘述的四卷本《日本政治史》的最後一卷。本卷的主題是說明從日俄戰爭勝利到大東亞戰爭失敗這一時期日本帝國主義的興亡。

在敘述本卷的內容時，我贊成論及兩篇關於日本「文化革命」挫折和其未完成問題的論文的内容。其中之一是歷史學者色川大吉關於十九世紀的自由民權運動的論述：

「在自由民權運動時期不斷湧現的各種敘事詩般的英雄傳說，全都是關於人民群眾中的小英雄們的傳說，是在民權結社的背景下創造出來的。我願指出，這是人民群眾的精神革命。我還認為，這也是一場文化革命。然而，自由民權運動却以失敗而告終。由『簞笠之楯，鋤耰之兵和席旗之隊』進行的維新的『第二革命』，儘管松澤求策^❶等寄予希望並進行奮鬥，還是在中途遭受挫折。這樣，『被解放了的人』又被強制回到過去的狀況，『已經噴射出來的能量』又受到壓制和被轉向他處，精神革命遭到了挫折。總而言之，作為未完成的文化革命，這場人民的暴風雨已經過去了。」（色川大吉：《自由民權》，岩波新書，1981年，第49～50頁）

❶ 松澤求策（1855～1887），自由民權運動的著名活動家，曾參與組織國會期成同盟，後兩度被捕入獄。

另外一篇，則是政治學者高島通敏關於二十世紀社會主義運動的論述（高島通敏編：《山川均集》——《近代日本思想大系》，築摩書房，1976年，第494頁。參見本卷第323頁）。

高島和色川談論了「文化革命」，那時，他們所說的「文化革命」的意義未必相同，但他們的論述在敘述日本政治史方面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

- 2 自十八世紀末至十九世紀初，日本人為對付西歐的衝擊，其思想和行動的基調是攘夷論的。攘夷論或與鎖國論相結合，或與為把「西洋之藝術〔技術〕」嫁接於「東洋之道德」上的親善論相結合，具有各種各樣的形態。吉田松陰原先曾認為，「互市皆得外夷無用之物，導致奢侈淫逸，失却我國有用之貨，而缺衣食之資、器用之本」（《獄舍問答》，山口縣教育會編：《吉田松陰全集》第二卷，1939年，第268頁）。1858年，他改變了這一舊的貿易觀念，強調「以國家大計言之，如欲振雄略、馭四夷，非航海通市又何以為之耶？」（《對策一道》，同上，第五卷，第137頁）同時認為與開國論相結合而形成了走向明治維新的實踐綱領（參見本書第一卷，第272～273頁）。明治維新乃是形成「獨立不羈」之主體的攘夷論與為了形成開國之主體的王政復古論即尊王論相結合的結晶，它結出的果實即是維新政府「萬邦對峙」的口號。已形成近代日本政治史研究主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試圖只從西歐資本主義的世界市場形成這一「世界史的規律」來觀察日本的開國，所以將其視為這違背「世界史的規律」的，往往輕視攘夷的意義。因此，我們與其學習歷史學者的著作，倒不如學習德國文學研究者片岡啓治的著作《攘夷論》（依扎拉書房，1974年）。由此而產生的問題則是，當日本國民抵抗維新政府的「有司專制」，開始進行自由民權運動時，在多大程度上以自由民權的思想來克服直至昨天還存在著的尊王攘夷思想。福島的豪商、民權家河野廣中，敘述了他閱讀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自由之理》

（中村正直譯）^②後「思想上發生了大革命」的經過，同時坦率地說「除忠孝之道外，幾乎微乎其微」，這是一段著名的話《河野磐州傳》，上卷，1923年，第185頁）。新潟的豪農、民權家山際七司這樣敘述自己思想鬥爭的過程：

「余以爲，漢學之舊思想與西歐之新思想〔之〕戰爭，幾乎較之從事戊辰戰爭更難幾分，然所幸者，乃舊思想盡敗，新思想獲全勝，余之喜可知矣。」（江村榮一、中村政則編：《國權與民權的相剋》——《日本民衆的歷史》第6卷，三省堂，1974年，第157頁） 3

所謂新思想的「獲全勝」，意指其發展到什麼程度呢？只有對此加以判定，才是「文化革命」的價值所在。從結局來說，自由民權運動未能克服由尊王攘夷論產生的「國家主義」——國權論，也未能有力地提出作為與民主相結合的「國民主義」的民族主義——民權論，並使之「獲全勝」。自由民權運動只是形成了遭受挫折的重要因素，並遺留下了把「忠孝之道」置於思想革命的範圍之外且對大正民主運動和政黨政治產生不利影響的重要因素。

在對付西歐的衝擊這一方面，中國雖然比日本更為落後，但爲時不久，便展開了日本所不可比擬的徹底的「文化革命」。中國爲對付西歐的衝擊，經歷了洋務運動、變法運動和革命運動三個階段，並不斷深入發展。在革命運動中具有劃時期意義的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謀求「破壞偶像」，從而出現了「強烈而徹底的社會和理智的變革」的時期（Immanuel C. Y. Hsü〔徐中約〕，

② 約翰·斯圖爾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英國唯心主義哲學家、經濟學家、邏輯學家。在道德和政治觀點上是功利主義者，鼓吹資產階級的民主和自由。《自由論》是主要著作之一，嚴復譯爲《群己權界論》。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Oxford U. P., 1970, p.581, 參見本卷第 137 頁)。

洋務運動，乃是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的曾國藩和李鴻章為對付內憂外患，在 1862 年起的同治年間作為「同治中興」而開始進行的改革運動。這裡所說的「中興」，與日本的「維新」不同，如果根據美國的東洋學者瑪麗·克拉巴·賴特夫人所說的定義，「它既不是政變，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只不過是依仗全體士大夫的能力與努力，使歷史上難以避免的沒落過程留下的一個『小陽春』」，是「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立足點」(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 Chih [同治] Restoration, 1862~1874*, Atheneum, 1967, p.45)。最簡明的敘述了同治中興在文化史上的意義的，是接受了賴特夫人見解的美國東洋學者本傑明·舒沃茨。他說：

「……像曾國藩、文祥、左宗棠、恭親王那樣的人，基本上是在傳統的範圍內致力於國內的復興。他們的『與西歐的對抗』，依然遵循著賀長齡所編書籍《皇朝經世文編》所顯示之治國策的傳統。第二次中英戰爭（亞羅戰爭）和太平天國之亂，的確使他們明確的認識到軍事技術近代化的絕對必要性。對軍事技術的關心，畢竟常常是儒教政治家的正統的關心。孔夫子本人雖然生來即抱有和平主義的志向，但當理想與現實之間發生矛盾時，則承認以軍事力量支撐國家的必要性。……如果把關心軍事作為正統，那麼關心軍事技術的改良，當也能列入卓越的儒教統治術的範圍之內……。同治時期政治家對內政改革的處方，代表了政治哲學中最正統的流派。這些政治家既要從太平天國的攻擊中拯救儒教的真理，又要獨力使國家不解體。」(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嚴復) and the West, Belknap press, 1964, p. 9~10)

當 1875 年同治時代被光緒時代取代之後，洋務運動也仍以李鴻章和張之洞為中心而加以推進，但由於 1895 年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便暴露出了它的局限性。為了對付內憂外患，必須把以引進西洋機器為主題的洋務論轉變為以改革政治制度為主題的變法論。東洋學學者小野川秀美論述了由洋務論向變化論的轉變。洋務論以「中體西用」為核心，即「內政之改革依據於中國之傳統，軍備之充實，仰賴於西洋之機器和技術，即西學。而且重視軍備更甚於內政」。變法論則是從「西洋致強實為經義之精」的見解出發，認為「軍備為末，內政為本」，因而它的特徵「已非中體西用，而可謂中即西之主張」（小野川秀美：《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三鈴書房，1969 年，第 4～5 頁）。於是，變法論就是主張制度（成法）的變革，而康有為和梁啟超則站在運動的前列。若把中國自洋務論向變法論的轉變套用於日本來觀察，那就相當於自佐久間象山的「東洋道德，西洋藝術」向明治維新的轉變。變法運動正是把明治維新奉為改革的典範，常常把「變法」稱為「變法維新」

（彭澤周：《中國的近代化與明治維新》，同朋舍，1976 年。Nori-ko Kamachi, *Reform in China. Huang Tsun-hsien* (黃遵憲) and the Japanese Model, Harvard U. P., 1981.)。 5

由於變法運動標誌著自「中體西用」向「中即西」的轉變，它便提出了「肩負起二千年來中國的所有思想與近代西歐對抗」這一深刻的課題（高田淳：《中國的近代與儒教》，《戊戌變法的思想》，紀伊國屋新書，1970 年，第 22 頁，參見本書第三卷，第 312～313 頁）。

這樣，變法運動提出了思想革命，但在 1899 年却因戊戌政變而遭挫折。變法運動雖然遭受挫折，但促使變法運動產生的帝國

主義列強對中國的瓜分以及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的義和團之亂，使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賴特夫人指出：

「像 1900 年的中國那樣，以一年的時間標誌戲劇性的分水嶺的例子，在歷史上是少見的。繼義和團之亂後，同盟國對北京的掠奪所暴露出的弱點，終於強迫中國作出最終的選擇：或是民族的滅亡，或是國家以及文明的全面變革。中國——清王朝政府、改革派及革命派——在一夜之間接受了挑戰。」(Mary Clabaugh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 ~ 1913*, Yale U. P., 1971, p.1)

在清王朝政府、改革派及革命派的爭鬥中，革命派否定了被改革派奉為變革典範的日本的明治維新。革命的理論家章炳麟更是這樣（高田淳：《章炳麟、章士釗、魯迅，辛亥革命的死與生》，龍溪書舍，1974 年，第 32 頁，參見本書第三卷，第 362 頁）。

以辛亥革命為目標的革命運動，若套用於日本來加以觀察，則基本上相當於自由民權運動時期。中國要求開設國會的署名請願者的人數，從 1910 年 1 月的二十萬名發展為 6 月的三十萬名，10 月更增至二千五百萬名（張明園：《立憲派與辛亥革命》，中國學術著作獎勵委員會，台北，1969 年，第 71 頁）。在此稍前的 1908 年 8 月，中國皇帝發布的上諭《九年預備立憲逐年推行籌備事宜諭》，仿效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關於開設國會的詔敕，定下了為期九年的預備期限（故宮博物館明清檔案部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上册，中華書局，1979 年，第 67～68 頁）。要求開設國會的革命運動，發起了文化革命，革命派自 1901 年 5 月起在東京發行的雜誌《國民報》，強調「必須掙脫數千年來牢不可破的風俗、思想、教化和學術的壓制」，要求打破傳統文化的桎梏（小野川：《清末政治思想研究》，第 245 頁）。文化革命運動在 1919

年的五四運動中全面開花。在美國的華人史學家林毓生，在其由本傑明·舒沃茨作序的著作《中國意識的危機》中，將五四時期的文化革命運動概括為「總體的偶像破壞運動」(a movement of totalistic iconoclasm)，並分析其特徵如下：

「五四運動是針對傳統的中國文化遺產的徹底革命，是傳統之後(post-traditional)中國史的轉折點，這個反傳統主義的廣度和深度，恐怕在一般近代史上也無類似例子。它是反映了二十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意識中文化一體性(cultural identity)的深刻危機的革命。而且，它也是此後文化與理智發達的前兆。」(Lin Yü-sheng [林毓生],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 p.6)

若與日本的歷史相對應，五四時期則相當於「大正民主」的時期。中國的革命派以陳獨秀、胡適、魯迅等思想家、作家為首，專心致力於「破壞偶像」。此時，日本的哲學家和田哲郎則將其所著《偶像再興》一書付印。中國五四時期文化革命的展開，照射出了文化革命「未完成」的日本與中國在近代史上明顯的本質上的不同之點，同時證明，繼續進行侵略的日本和繼續遭受侵略的中國，不久即由於自滿洲事變、中國事變直至大東亞戰爭的十五年戰爭，而創造出了使勝者與敗者的地位相互顛倒的岔路。以「持久戰」對抗長達十五年的日本侵略戰爭，給中國帶來最後勝利的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正是從五四運動中產生的。

我著手編寫本書的意圖之一——如第一卷序言所說——在於找到解決工場手工業論爭問題的觀點，而這則是我從事學問的出發點。然而，在對付西歐衝擊的問題上，日本與中國不同，正如服部之總敘述的那樣，要從兩國的「社會、物質生產發展階段」